



KAS-Schriftenreihe China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系列丛书



国家与真理

Der Staat und die Wahrheit

奥托·迪蓬霍伊尔
Otto Depenheuer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

No. 94 (ch/de)
Beijing 2010

Herausgeber:

Project Office of the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in the PRC
Office C 813, Beijing Lufthansa Center
No. 50 Liangmaqiao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125

Tel: 0086-10 6462 2207 / 08

Fax: 0086-10 6462 2209

E-mail: beijing@kas.de

Webpage: www.kas.de www.kas.de/china

Verantwortlich:

Wolfgang Meyer

Die Auffassungen des Autors geben nicht unbedingt die Ansicht der KAS wider.

发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中国项目执行人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50号燕莎中心写字楼C813室

邮编：100125

电话：0086-10 6462 2207 / 08

传真：0086-10 6462 2209

E-mail: beijing@kas.de

主页：www.kas.de www.kas.de/china

主编：梅视

文章内容仅代表笔者之观点，与阿登纳基金会立场无关。

KAS-Schriftenreihe China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系列丛书

国家与真理

Der Staat und die Wahrheit

奥托·迪蓬霍伊尔
Otto Depenheuer

No. 94 (ch/de)
Beijing 2010

目录

序言	1
一、“真理”的吸引力	3
二、真理在自然科学中的胜利进军	3
三、在神话中寻找意义——宗教的真理概念	4
四、从真理的守护者到反对真理的捍卫者	6
五、真理与国家	8
六、国家的真理	9

Inhalt

Vorwort	13
I. Faszination „Wahrheit“	15
II. Der Siegeszug der Wahrheit in den Naturwissenschaften	15
III. Sinnfindung im Mythos – Der Wahrheitsbegriff der Religionen	16
IV. Vom Hüter der Wahrheit zum Schutzgaranten gegen die Wahrheit	19
V. Die Wahrheit und der Staat	20
VI. Die Wahrheiten im Staat	22

序言

梅 硯

这本小册子旨在将奥托·迪蓬霍伊尔在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ZfD)和阿登纳基金会(KAS)2009年11月18日在北京举办的一场活动上所做的报告介绍给更多的读者。

作者探讨的是对国家的理解,即现代自由宪法国家提供给公民的具有开放性和相对性的真理,国家并没有对现实存在的意义问题给出先验性答案。因此,国家可以提出何种真理要求呢?迪蓬霍伊尔教授提出该问题时,也考虑到了经常引发中德专家争辩的人权讨论。中国和德国--或者也可以说是整个"西方"--具有不同的思想史传统,因此德国研究中心(ZfD)和阿登纳基金会(KAS)认为有关国家与真理的问题对于跨文化交流而言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题目。

迪蓬霍伊尔教授此次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进行客座讲学提供了一次契机,

可以为中国法学家、政策顾问和其他社会传播者做一场讲座,他们都是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和阿登纳基金会的朋友与伙伴。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和阿登纳基金会此次介绍了奥托·迪蓬霍伊尔这位著名的德国学者。迪蓬霍伊尔在科隆大学教授普通国家学、公法和法哲学,是科隆大学国家哲学与法律政策研究所所长。此外,他还担任阿登纳基金会在科隆大学的联系讲师。

迪蓬霍伊尔对于国家的理解在德国并非始终得到了一致的认同。由于国家被赋予的价值多于德国目前得到普遍支持的应赋予单个公民的价值,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对于国家的理解有悖于启蒙主义对于国家的理解。例如,迪蓬霍伊尔认为,现代福利国家难以再遵循超出个人追求幸福之外的理想,他认为这一点颇成问题。他将具有基本法特点的自由宪法国家称作为满足

人的权利而给理性设定了界限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是一种自由、宽容和保持距离的国家形式，它奉行怀疑务实主义而非理性完美主义，奉行相对主义而非意识形态极权主义。

感谢奥托·迪蓬霍伊尔教授的文章和他所做的引发了热烈讨论的报告。感谢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尤其是要感谢汉马可教授，感谢他们邀请迪蓬霍伊尔教授前往大学讲课，特别要感谢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和陈洪捷主任共同举办了这次活动。

梅砚

阿登纳基金会中国项目办公室主任

陈洪捷 教授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与真理

奥托·迪蓬霍伊尔

一、“真理”的吸引力

在任何时代，真理都对各大洲的人们具有吸引力，寻找真理对于许多人而言便是生活的内容，以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世界的初始，它的诞生，它在宇宙中的位置，世界存在的意义，对世界独特的追问，特别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人们并没有这些问题的直接答案，相反，这些答案笼罩在神秘之中，幽暗、令人费解且颇令人生疑。神话传说一直帮助人们生活于神秘之中，然而，在“伟大故事结束”（德里达）之后，似乎许多人都觉得这条（出）路已经走不通了。对有关我们真理问题答案的追寻，对生活真正意义的追寻，要比古老的神话传说年代更为久远和富有折射性，数百年来，它一直属于所有科学之母的哲学的领域。其“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和我们应当做些什么”的基本问题引导着人们对于真理的不懈追寻，但人们从来都没有寻找到最终的拯救一切的答案。不过，尽管

如此，直到当代，对于真理的好奇仍然是人类寻找、研究和认知的动力。谁不曾梦想过能够汲取“智慧树”的营养，不曾梦想过有朝一日能够“象上帝”那样。众所周知，这是蛇的承诺，蛇借此引诱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树：“这样，你们就会象上帝一样”（创世记3,5）。

二、真理在自然科学中的胜利进军

正象人们知道的那样，亚当和夏娃没有能够抵挡得住这种诱惑。他们吃了智慧树上的东西，人类在“成为象上帝那样的人”的道路上也的确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宇宙（相对论）、微观宇宙（量子物理）、人类基因组（遗传信息源码）和人的复制的秘密已经得到相当大的开发。我们登上了月球，移植心脏，养殖人类的替代细胞组织，借助核能，我们能够为地球提供能源，也可以数度毁灭地球，通过因特网和电话，我们随时可以与所有人进行直接联

系。这真是当代人的胜利进军，而“智慧树”上尚悬挂着某些果实，还有许多尚待我们去认知的东西。

正是由于质问和研究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当代科学才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而且正是如此，我们才能将现代性理解为一个阶段概念。上帝允许亚当和夏娃在天堂里做任何事情，但却禁止他们吃“智慧树”上的东西（创世记2，16-17）。因此，直至中世纪末期，对生命界限和世界毫无目的的追求始终被视为轻薄和不尊重上帝，因此遭到了禁止。人的任务并非认识世界和塑造世界，而是融入这个以不可变的方式介绍给他们的世界，顺从它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例如，经院哲学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并非着眼于绝对的认识，而是为了加深不被质疑的启示信仰并且使其合理化。直到文化复兴之后，作为个体人格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才逐渐实现了对宗教束缚的摆脱，指明了从“咎由自取的不成熟”（康德）中走出来的道路，为自由、开放和自身作为目的的追求、研究、发明、发现和调查铺平了道路。

这一科学的认识发现过程要归功于特殊的新的和严格的真理定义。人们开始将认识的形式与方式明确区分开来，这些形式与方式在此之前构成了思维的混合体：感觉、相信、推测和知道，在过去，这一切几乎都是一样的，现在则做了严格的区

分。自然科学的胜利进军归功于其特殊的、经验实证的真理概念：只有任何其他人也必须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因为它可以从经验上加以主宰，经过实验得到确认，因此是积极给定和在主体之间可以传播的，也就是说，不想让人认为自己弱智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这种东西。现在，我们第一次能够将许多研究者和许多代人的知识系统地加以汇总，能够从量和质上将知识储存起来，以指数函数的方式增加知识。在今天的知识社会里，诸多研究小组分布于世界各地，通过因特网联系在一起，他们共同致力于找到相同问题的答案。看不到科学进步的终点，更看不到这将是怎样一个终点。

三、在神话中寻找意义——宗教的真理概念

一切皆有代价。众所周知，亚当和夏娃为偷吃“智慧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被逐出了天堂（创世记3，16-24）。他们与上帝失和，被排斥在与自然的和谐之外，自那时起，人类便开始偿还自己的“原罪”，重新回到与上帝和世界的一体中去。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及其衍生品正是都遵循这样一个目标，尽管各种宗教的传说各不相同，但它们的目标却都是克服世界上的痛苦（疾病与死亡，仇恨、嫉妒和欲望等激情）以及获得天堂永恒的幸福与安宁，至于这种幸福与安宁是叫天堂抑或涅槃则无关紧要。

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被逐出天堂的代价，这一神话在我们现在这个技术上高度复杂和全球化的知识世界中也留下了它的印迹。严格说来，我们可以做如下表述：我们几乎知道了一切，但我们不再知道这一切的益处何在，研究的意义又应当何在，甚至我们的研究是不是已经开始针对自己了呢？“我们允许做那些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吗？”这是对自己变得不自信的知识世界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设计创造人，能够象对计算机那样对人类的大脑加以描述和进行格式化，用原子毁灭世界，或者由于污染环境和气候危机而逐渐让世界变得无法居住，我们就将如上帝一样吗？事实上，所有的自然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的伟大认识都忽略了一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以不容忽视的方式再度居于中心位置：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在文艺复兴以来长达数百年的繁荣时代，自然科学令宗教日益谨慎踌躇，令创造意义的精神科学日益遭到排挤，因为后者认为其宗教真理必须屈服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理概念。它们忽略了一点，即所有自然科学知识都没有回答人的精神、灵魂和情感需求，它们忽略了有关生命意义的宗教真理所遵循的规则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真理。路德维希·维根斯坦在其被视为哲学实证主义圣经的“逻辑哲学论”（1921年）一书的末尾处对自然科学真理和宗教哲学

真理这两个真理进行了精彩的描写，他自信地做了总结，认为自己的思想“绝对无疑”正确，他的这本书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哲学问题）。在这之后，他又承认这一切根本尚未触及人的生命问题，作为坚定的实证主义者，维根斯坦表示，这是他唯一无法表态的问题。最后一句名言：“不知道的事情，必须保持沉默。”

实证主义者必须保持沉默时，宗教就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¹，宗教也是这样做的，数百年来一直如此，从传统来看，它们这样做的时候一直贴上了“真理”的标签。作为启示性宗教，它们宣布了上帝的真理，作为自然宗教，它们宣布了自然界的真理（天空和世界的真理）。然而，宗教的真理概念却不同于实证主义自然科学的真理概念，至迟从康德和黑格尔的批判认识论开始，我们也能够从概念上加以区别，因为我们知道纯粹理性的界限何在。宗教知识与自然科学的知识概念不兼容，它们是互相对立的。康德以辩护士的方式进行了表述，精彩地表明了这一差异，他说，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仅仅确定了知识的界限，为的是给信仰留出空间。”

抽象地说来，哲学和宗教的信仰真理并非客观的自然科学真理，而是主观的传播意义上的信仰。我们可以将这种信仰称

¹ 实务哲学和解释生命的人文科学同样如此。不过，由于它们的特点是不具政治影响和统治要求，而是“呆在自己的地方”，因此不会产生国家哲学上的秩序问题，因此下文对此不予考虑。

为“真理”，从传统上来看，人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宗教的合理真理概念有着与精确的自然科学不同的起源（上帝），不同的任务（意义）和不同的逻辑（主观性），它并不想让所有人都承认其必要性和被证明，而是要回答人们提出的生命之意义这一问题。

这样一来，宗教上的真理概念一方面从题义上便较自然科学的真理概念更为宽泛，因为它涵盖了整个生命。但另一方面，这一概念也更为专制、不妥协、不宽容和不易改变。在此，圣经同样定了拍子：“除我之外，你不应有其它的上帝”（出埃及记，20，3）。自然科学的真理始终并且从一开始就只是临时的真理，它公开要求并欢迎证明自己的对立面，被驳倒的真理确实且不加抵抗地让位于更好的认识，但信仰上的真理却是不能被驳倒的。由于这样的真理植根于主观的、并非以理性获得的宗教信仰之中，就不需要被反驳引入歧途。相反，世界越没有信仰，在信仰中并通过信仰拯救世界的挑战就越大。宗教信仰不容别人对其进行教诲，它也不去学习，而是教授和传教。如果这样的信仰没有“呆在自己的地方”，而是对世界做出了普适的全面解释，对所有问题都给出了答案，而且所有的答案还都是决定天堂或地狱，救赎或诅咒的答案，就不难理解宗教真理无法

容忍妥协，也必然反对所有的怀疑、反驳和选择，这样一来，宗教真理这种潜在的专制性就可以被初步识别出来。只要在相对均质的共同体中，某一真理得到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这种潜在的专制性就难以被发现，在这样的国家里，人类创造了伟大的文化。然而，如果某一唯一能够缔造幸福的真理以重要的政治形式遭到质疑，那么这一普适真理就有崩溃之虞，它就可能丧失其创造意义和引导定位的功能，这样一来，宗教真理便会显出其令人不快、不宽容和好斗的面孔。如果这样的宗教真理得到政治势力的支持以及被其当作工具，宗教真理均质性甚至是暴力的潜质便会暴露无遗，这样一来，最终国家就参与到博弈中来。

四、从真理的守护者到反对真理的捍卫者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是宗教与国家联合起来的例证²。众所周知，罗马帝国认为自己拥有的是一种神圣的秩序，这种秩序包含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可分割，是精神宗教和世俗政治性的，它将自己创造自由、统一和意义的力量归结于此。皇帝和教皇并非精神与世俗秩序的代表者，而是基督教共和体中担任不同职务的人。这种统一思想解体首先是由于发展为科学

2 可参阅：奥托·迪蓬霍伊尔著“真理抑或和平：原教旨主义对现代国家的挑战”，载于“原教旨主义对国家、教会和社会的挑战”，关于国家与教会的埃森谈话，33期，1999年，第5页及下。

的神学，神学将精神与世俗分离开来，国家与教会的分离与独立蕴含着相互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如果说教廷以前还能自行决定授职之争，然而在信仰丧失了自己缔造统一的功能、罗马由此而丧失了真理捍卫者这一权力要求的合理基础的时候，精神的一面便遭到了极大的削弱。1517年，马丁·路德贴出了论纲，天主教的统一随之瓦解³，两种互相竞争的真理主张的同质潜力便以残酷的方式爆发出来。奥地利的斐迪南二世在其政府在施蒂利亚就职时的宣誓以具有代表性的方式表明了冲突各方的这种自我理解：“宁愿统治沙漠，宁愿享用水和面包，宁愿与女人和孩子去乞讨，宁愿身体被割成碎块，也不能容忍对教会的不公，不能容忍异教。”冲突各方，天主教徒、路德教徒和改革派在这种杀戮性真理的逻辑方面观点一致。宗教冲突作为宗教斗争是毫不妥协的，同样，作为政治斗争，宗教冲突也必须毫不留情和极端。这场语文学上的内战历时数十年，无论从神学还是军事上都无法得到解决，这场内战让欧洲大部分地区——德国、英国和法国——陷入长达数十年的屠杀，整片地区荒无人烟，一半以上的人口沦为牺牲品。

然而，正因如此，这场宗教引发的内战却无意和不自觉地成为主权世俗国家的神学思想取得实际突破的原因，因为摆脱危机的出路只能是剥夺宗教力量的权力。

为此，必须找到独立于文化和教派的真理形式，这种真理必须是所有人都能够认识到的并且借助先验的信念必须予以赞同的，无论他们属于怎样的文化、宗教、国家或者民族。这种世俗真理的内容是和平，其掌管者是极权的、因而在宗教上禀持中立的国家。只有国家才能够作为主权决策机构和秩序力量保护国家内部的和平，才能够确保结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局面，由此成为全体公民的家园，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自那时起，现代国家便成为中立机构，超越争执不下的各宗教派别。法国大革命以后，国家完全从宗教与教会领域撤出，宗教成为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为了和平，国家放弃了真理，它只是政治力量，但并非真理的捍卫者：“权威，而非真理制定法律”，托马斯·霍布斯的这番表述诠释了现代国家的概念。

然而，世俗国家也提出了“真理”要求，即无条件维护和平，只是国家不能再主张全面的超验“真理”。世俗国家不能也不愿就绝对真理和价值做出抉择，用康德的话来说，它的真理是超验的，针对使得公民能够和平自由共处的形式和程序条件，它存在于国家确保的政治过程原则上的结果开放性之中，为了和平，所有人都必须接受这一过程的结果。在世界观方面禀持中立的国家满足于这个倒数第二的理性真理，为的是不必在终极真理上偏袒某一方。

3 迪蓬霍伊尔（2 7期），第 485/495 页及下。

作为国家，它原则上拒绝终极认识，这并非出于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而主要是出于理性的信念。为了服务于无条件的和平任务，国家将自己的任务限制在确保所有公民在和平条件下享有平等自由。

无疑，自由的宪法国家也无法避开真理的逻辑，国家的真理同样不容妥协。作为和平的保障，国家的作用不容置疑，不能对此进行谈判或做出妥协，特别是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以极端方式对世俗国家构成挑战的时代就更是如此。正如我们能够看到的那样，主张普适真理的派别，即或许是最后的宗教信仰真理的派别再度使用前所未有的暴力，同全世界的非信士进行着斗争，这场斗争的过程是不明确的，结果是开放的，结论则是不可预知的。无论如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作为反击性民主国家做出了抗击内外敌人以保护自己的承诺。法治国家自我主张⁴的这一逻辑体现于下述悖论，即不给自由的敌人以自由，不对不宽容表现出宽容⁵。

五、真理与国家

然而，一国之中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唯一的团结性的信仰不复存在之后四处

蔓延开来的集体意义真空给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各个时代的浪漫主义者都在抱怨处于具有不尽相同主张的国家与宗教这两个相互独立的体系之中的人与人之间令人痛苦的不和，他们神化了中世纪，认为那是业已失落的统一天堂的投影。的确，自由宪法国家形式上的、开放的和相对的真理或许能够让我们的理智得到满足，但却无法满足我们的心灵，心灵仍然在继续寻找至关重要的意义问题的答案。事实上，继启蒙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时至今日，国家仍然难以摆脱被当作传播意义或者给定意义的机构而被工具化的危险。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极权的由国家实施的真理使命，目前，我们又目睹着自由的人权真理使命。

1、二十世纪的极权使命

从历史上看，对填补宗教意义空虚的渴望很快就从意识形态上得到了满足，但这种满足却是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从不曾梦想到的。宗教有关来世救赎的观点被世俗化了，现世希望的想象丰富了这种观点，国家则将其作为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加以利用：上世纪的两场极权政治运动许诺人们的是未来统治自由的天堂，带给他们的却是地球上的地狱。1989/90的划时代转折最终开启了这些大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但下一个意识形态已经上路。

4 奥托·迪蓬霍伊尔，“国家的自我主张”，第2版，2008年。

5 可参阅奥托·迪蓬霍伊尔著“反击性民主”的丛林王国：六十年的成功历史，载于“政见”，460期，2008年，第15页及下。

2、世界使命——人权

目前，人权思想决定着西方宪制国家的认同与自我理解，其锋芒尚未黯淡，西方国家想用自由与民主的法律保障和有效确保来衡量自己和其它国家⁶。西方人权政策的基础是确信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具有政治真实性和历史必然性：人权“仅以自身尊严的光辉和有关人的真理的统治”引领着宪法，旨在“对全世界进行教诲”⁷。因此，全世界都应当“被人权这一西方国家思想最成熟和最宝贵的果实治愈。”应当在所有地方都贯彻自由、人权、市场和民主，最好是马上就加以实施。普适人权思想恰恰是西方世界世俗化的真理占有，它带来的是历史上为人熟知的结果，因为普适真理要求这一逻辑包含了以下内容，即它们并不满足于作为纯粹的学说以及在意识到理论正确性时坚持与生活保持距离，这些真理希望成为现实。真理占有的确定性是有义务的，我们不能拥有真理，却不得出相关后果。占有真理可以防止机会主义，但也不会妥协，它会带来定位的确定性，但同时也强制对非真理采取不宽容。只要仅限于建议、咨询和法治国家促进项目，这样做并无什么不妥。然而，如果采取暴力和文化不可知论及轻视的态度进行人道干预，借以在世界各地植入人权，那么西方的人权输出政策就必须注意不要将自己和

自己的理想反常化，更何况是西方强权的人权输出政策，阿布·格莱布是第一个但并非唯一的凶兆。

因此，这个世界上的自由宪法国家最好将那些善治和人权真理“留在自己那里”。如果它们制订人权标准与榜样，就不乏对此感兴趣的人主动追寻这些标准与榜样。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永远不应再次以暴力手段服务于真理或者被人为此加以利用。人权思想是历史形成的偶然性成就，是文化成就，我们可以为此感到骄傲，应当支持人权并加以宣传。但是，人权思想并不是准宗教真理，不能赋予真理使命和真理进军以合法性。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它是倒数第二个真理，因此也应保持其相对性与偶成性。

六、国家的真理

那么，给予定向和意义的宗教真理在自由国家中的位置又何在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代启蒙思想都认为宗教将在社会中逐渐消亡，戒毒治疗便足以让人戒掉人民的鸦片。在尼采宣布“上帝已经死亡”之后，欧洲深刻的世俗化似乎确实成为了时代的特征，而欧洲基督教的状况似乎更多是证实了这种推断。当然，也有日益增

6 可参阅下文：奥托·迪蓬霍伊尔著“人权普适性的风险与副作用”，载于约瑟夫·伊森泽（编著）“作为世界使命的人权”，2009年，第81页及下。

7 埃米尔·布特密（Emile Boutmy），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及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1902年，引自布莱德（Bryde）“基本权利手册一”，2004年，第17条，边码15。

加的宗教生命力的明显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反向运动，主要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伊斯兰国家。无论如何，宗教及其真理的死亡仍将滞后一段时间，在这之前，国家的宗教真理这一问题就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和国家法方面的挑战。

从宪法的角度来看，答案相对简单：在现代世俗自由的国家里，宗教真理和世界观真理通过基本权利和民主获得了合法性并得以多元化。国家赋予的自由的即否定性的“免于”有意识地没有回答人的生命和真理问题，而是将其留由个人做出自由的选择。从宪法角度而言，国家不得不也不愿回答这些真理问题，而个人和宗教团体则必须做出回答，由于宗教自由，无疑要同其它竞争性宗教和世界观团体进行竞争。因此，从基本权利的角度来看，宗教的真理表述构成的正是以合宪的方式行使宗教和言论自由。重要的是下面这句话：“自由开启了个人发现真理的道路”，无论是单个人还是在宗教团体的范围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俗国家的象征是它不得援引建立在宗教或者世界观真正基础之上的理由用以支持自己的行为。此外，国家还必须尊重并保障各种不同信仰之间的和平共处，必要时强迫不同信仰相

互宽容。在宪法国家中，宗教真理信念自身并不能赋予其提出的唯一有约束力的要求以合法性，在相对主义的民主辩论中，它只能通过多数决定加以贯彻，否则，它们尽管从基本权利的角度不失为合理的站得住脚的立场，但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则没有约束力。

当然，国家同样对人的意义需求的回答感兴趣，正如人们对此同样感兴趣或者必须感兴趣一样。当然，对于生活在现代国家的个人来说，回答意义回答绝非易事，个人必须根据信仰做出决定，却不能在经验和实证的意义肯定自己的真理是真实的。个人必须接受某一真理，他将永远无法摆脱自己从主观上给自己制订了该真理这一意识。他的信仰行为植根于主观性，也就是说并非客观给定的，而是随时可以通过撤销之诉加以修正的，这就使得信仰千真万确成为勇敢的行为。因此，一直以来，人们就努力让宗教真理和积极的（信仰）设定看起来象是“非人为的”（黑格尔），宣称它是绝对的不得加以盘问的，这样一来，人的尊严便不容侵犯，人权也便不容处分⁸。

无疑，对于那些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信仰力量的人来说，他将为自己坚定的信仰获得极大的奖赏：“真理将让你们获得

8 参阅约瑟夫·伊森泽著“人的尊严：寻找绝对的世俗国家”，AR 131，2006年，第173页及下；奥托·迪蓬霍伊尔（Otto Depenheuer）著“禁忌与权利：问题剖析”，载于“权利与禁忌”，2003年，第7页及下，“神话的力量与法律的理性”，引言，载于引文出处同上，作为命运的神话，2009年，第7页及下。

自由”，圣经的启示如此承诺（约翰福音8，31）。但社会和国家同样从公民践行的信仰生命力中获益，自由赋予每个人寻找、发现和体验主观真理的自由，社会和国家由此从这种信仰确实能够“移山”中获益。的确，尽管人的主观信仰真理只是“思想的可能性”，但这些真理过去和现在都创造了“存在的现实”（维克多·E·福兰克尔）。确实如此，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见证通常都是“成为现实的思想可能”，由此，我们至今仍然共享着前辈的宗教信仰见证。无论是在北京的天坛，吉萨的金字塔还是科隆大教堂，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感觉得到人们对失去的天堂的渴望，至少是从美学上感觉得到真理能够释放出怎样的创新创造力。国家与此有何关系呢？毫无关系。这很好。

Vorwort

Mit diesem Band wird ein Vortrag von Otto Depenheuer einem weiteren Publikum zugänglich gemacht, den das Zentrum für Deutschlandstudien (ZfD) der Peking Universität und die Konrad-Adenauer-Stiftung (KAS) am 18. November 2009 in Peking präsentiert haben.

Er befasst sich mit Fragen des Staatsverständnisses. Es geht um die offene und relativistische Wahrheit, die der moderne freiheitliche Verfassungsstaat seinen Bürgern bietet. Als wahr erlebte Antworten auf existentielle Sinnfragen bietet er den Menschen nicht. Welchen Wahrheitsanspruch kann der Staat deshalb stellen? Prof. Dr. Depenheuer stellt diese Frage auch in Hinsicht auf die Menschenrechtsdiskussion, die zwischen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Fachleuten oft kontrovers diskutiert wird. Die unterschiedlichen geistesgeschichtlichen Traditionen in China und in Deutschland – oder auch „im Westen“ insgesamt – ließen die Fragen von Staat und Wahrheit für ZfD und KAS als ein interessantes Thema für den interkulturellen Austausch erscheinen.

Eine Gastdozentur von Professor Depenheuer

am Chinesisch-Deutschen Institut für Rechtswissenschaft der Chinesischen Universität für Politik- und Rechtswissenschaften bot eine willkommene Gelegenheit zu einem Vortrag vor chinesischen Rechtswissenschaftlern, Politikberatern und anderen gesellschaftlichen Multiplikatoren aus dem Freundes- und Partnerkreis von ZfD und KAS.

ZfD und KAS stellten mit Otto Depenheuer einen angesehenen deutschen Gelehrten in China vor. Er ist Professor für Allgemeine Staatslehre,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Rechtsphilosophie und Direktor des Seminars für Staatsphilosophie und Rechtspolitik an der Universität zu Köln. Nebenbei ist er auch Vertrauensdozent der Konrad-Adenauer-Stiftung an seiner Hochschule.

Depenheuers Staatsverständnis findet in Deutschland nicht immer ungeteilte Zustimmung. Es stünde insofern gegen ein aufgeklärtes Verständnis von Staatlichkeit, als es dem Staat gegenüber dem Individuum mehr Wert einräume als es in Deutschland heute allgemein vertreten wird. Depenheuer thematisierte beispielsweise, dass moderne Wohlfahrtsge-

sellschaften nur noch schwer Idealen folgen könnten, die über das individuelle Glücksstreben hinausgehen und sieht dies als problematisch an. Den freiheitlichen Verfassungsstaat grundgesetzlicher Prägung bezeichnet er als einen Staat, der der Vernunft Grenzen setzt, um den Rechten der Menschen gerecht zu werden. Er sei die Staatsform der Freiheit, Toleranz und Distanz, des skeptischen Pragmatismus statt rationalen Perfektionismus, des Relativismus gegenüber ideologischem Absolutismus.

Dank gebührt Prof. Dr. Otto Depenheuer für seinen Text und den Vortrag, der eine lebhaftige Diskussion hervorgerufen hat. Dank gebührt dem Chinesisch-Deutschen Institut für Rechtswissenschaft an der Chinesischen Universität für Politik- und Rechtswissenschaften und dem Deutschen Akademischen Austauschdienst (DAAD), insbesondere Prof. Dr. Marco Haase dafür, dass sie Prof. Dr. Depenheuer an ihre Hochschule eingeladen haben und vor allem dem Zentrum für Deutschlandstudien und seinem Direktor Prof. Dr. Chen Hongjie als Mitveranstalter.

Wolfgang Meyer

Konrad-Adenauer-Stiftung Peking

Prof. Dr. Chen Hongjie

Zentrum für Deutschlandstudien, Peking Universität

Der Staat und die Wahrheit

Otto Depenheuer

I. Faszination „Wahrheit“

Die Wahrheit hat die Menschen zu allen Zeiten und auf allen Kontinenten fasziniert, die Suche nach ihr war und ist vielen Lebensinhalt. Der Anfang der Welt, ihre Entstehung, ihr Ort im Kosmos, der Grund ihrer Existenz, die Frage nach ihrer Einmaligkeit und vor allem 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n ihr – die Antworten auf diese Fragen sind dem Menschen nicht unmittelbar gegeben, sondern vom Geheimnis umgeben, dunkel, rätselhaft, fragwürdig. Mythische Erzählungen haben zu allen Zeiten den Menschen geholfen, mit dem Geheimnis zu leben. Doch nach dem „Ende der großen Erzählungen“ (Derrida) scheint dieser (Aus-) Weg vielen nicht mehr gangbar zu sein. Das Streben nach Antwort auf die Frage nach der Wahrheit über uns, nach dem wahren Sinn des Lebens war – jünger und reflektierter als die alten Mythen – über Jahrhunderte die Domäne der Philosophie, der Mutter aller Wissenschaften. Ihre Grundfragen – „Was können wir wissen und was sollen wir tun?“ – leiteten die unermüdliche Suche nach der Wahrheit ein, ohne dass je die letzte, alles erlösende Antwort gefunden worden wäre. Aber die Neugier nach der Wahrheit bleibt ungeachtet dessen bis in die Gegenwart ungebro-

chener Antrieb menschlichen Suchens, Forschens und Erkennens. Wer hat ihn nicht schon geträumt, den Traum, einmal, und sei es nur ein bisschen, vom „Baum der Erkenntnis“ zu naschen, einmal zu sein „wie Gott“. Das war bekanntlich das Versprechen der Schlange, mit dem sie Adam und Eva verführte, vom Baum der Erkenntnis zu essen: „dann werdet ihr sein wie Gott“ (Genesis 3, 5).

II. Der Siegeszug der Wahrheit in den Naturwissenschaften

Bekanntlich haben Adam und Eva der Versuchung nicht widerstehen können. Sie aßen vom Baum der Erkenntnis und tatsächlich ist die Menschheit inzwischen auf dem Weg, „wie Gott zu werden“, schon ein ganzes Stück vorangeschritten. Die Geheimnisse des Alls (Relativitätstheorie), des Mikrokosmos (Quantenphysik), des menschlichen Genoms (Quellcode der Erbinformationen) und der menschlichen Reproduktion sind weithin erschlossen. Wir waren auf dem Mond, wir verpflanzen Herzen, züchten menschliches Ersatzgewebe, wir können die Erde mit der Atomkraft energetisch ebenso versorgen wie sie – und das gleich mehrfach – vernichten, wir können mit

jedem Menschen zu jeder Zeit via Internet und Telefon unmittelbar kommunizieren. Ein Siegeszug des modernen Menschen für wahr. Und am „Baum der Erkenntnis“ hängen noch manche Früchte: es gibt noch viel zu erkennen.

Möglich wurde dieser wissenschaftliche Triumph der Moderne – und just dadurch kann man die Moderne als Epochenbegriff fassen – durch die Befreiung des Fragens und Forschens von religiöser Bevormundung. Schon Gott erlaubte Adam und Eva im Paradies alles, aber verbot ihnen, vom „Baum der Erkenntnis“ zu essen (Genesis 2, 16-17). Und so galt bis zum Ende des Mittelalters das ziellose Fragen nach den Grenzen des Lebens und der Welt als frivol, als Gotteslästerung, als verboten. Die Aufgabe des Menschen war nicht, die Welt zu erkennen und zu gestalten, sondern sich der als unwandelbar vorgestellten Welt anzuverwandeln, einzuordnen und sich in ihr einzurichten. Die intellektuellen Leistungen der scholastischen Philosophie beispielsweise zielten nicht auf voraussetzungslose Erkenntnis, sondern dienten der Vertiefung und Rationalisierung des nicht in Frage gestellten Offenbarungsglaubens. Erst das erwachende Selbstbewusstsein des Menschen als individuelle Persönlichkeit seit der Renaissance ermöglichte allmählich die Emanzipation von religiöser Bevormundung, wies den Weg aus der „selbstverschuldeten Unmündigkeit“ (Kant) und ebnete den Weg für freies, offenes, selbstzweckhaftes Fragen, Forschen, Erfinden, Entdecken und Untersuchen.

Pate für diesen Prozess wissenschaftlich fundierten Erkenntnisgewinns war ein spezifisch neuer, scharf gefasster Wahrheitsbegriff. Man begann nunmehr deutlich zwischen verschiedenen Formen und Modi der Erkenntnis zu unter-

scheiden, die zuvor eine Mélange des Denkens bildeten: ahnen, glauben, vermuten und wissen – das war früher fast das Gleiche, nunmehr wurde es scharf getrennt. Der Siegeszug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verdankt sich ihrem spezifischen, empirisch-positivistischen Wahrheitsbegriff: nur das gilt als wahr, was jeder andere auch als wahr einsehen muss, weil es empirisch verifizierbar, experimentell gesichert, somit positiv gegeben und daher intersubjektiv vermittelbar war, dass also von jedem anerkannt werden musste, so er denn nicht für schwachsinnig gehalten werden wollte. Jetzt ließen sich erstmals systematisch die Erkenntnisse vieler Forscher und vieler Generationen additiv zusammenfassen, Wissen quantitativ wie qualitativ speichern und exponentiell steigern. So arbeiten heute in der modernen Wissensgesellschaft viele Forschergruppen über die ganze Welt verteilt, übers Internet vernetzt, an Lösungen für gleiche Problemstellungen. Ein Ende des wissenschaftlichen Fortschritts ist nicht abzusehen, erst recht nicht, was für ein Ende.

III. Sinnfindung im Mythos – Der Wahrheitsbegriff der Religionen

Alles hat seinen Preis. Bekanntlich haben auch Adam und Eva für ihr Naschen vom „Baum der Erkenntnis“ einen hohen Preis gezahlt: nämlich mit der Vertreibung aus dem Paradies (Genesis 3, 16-24). Entzweit mit Gott, ausgeschlossen von der Harmonie mit der Natur, sucht die Menschheit seither, ihre „Erbsünde“ zu tilgen, wieder zurückzufinden zur Einheit mit Gott und der Welt. Die Religionen dieser Welt – und ihre Derivate – haben genau dieses Ziel gemeinsam: bei aller Unterschiedlichkeit ihrer tragenden Erzählungen zielen sie auf Überwindung des Leidens an und

in dieser Welt (Krankheiten und Tod, Leiden-schaften wie Hass, Neid, Begierde) und das Erlangen ewiger Seligkeit und Ruhe – ob das nun Paradies oder Nirwana heißt, ist so ziemlich nebensächlich.

Der Mythos von der Vertreibung aus dem Paradies als Preis des Wissens hat auch in unserer heutigen, technisch hochkomplexen und global vernetzten Wissensgesellschaft ihre Spuren hinterlassen. Pointiert könnte man formulieren: Wir wissen fast alles, aber wir wissen nicht mehr, wozu dies alles gut sein soll, wo der Sinn des Forschens liegen soll, ja ob sich unsere Forschungen nicht anfangen, sich gegen uns selbst zu richten? „Dürfen wir, was wir können“? – fragt eine sich selbst unsicher werdende Wissensgesellschaft. Werden wir nicht tatsächlich und buchstäblich wie Gott, wenn wir Menschen nach unserem Design fertigen können, menschliche Gehirne wie Computer beschreiben und formatieren können, die Welt atomar vernichten oder – via Umweltverschmutzung und Klimakatastrophe – langsam unbewohnbar machen? Tatsächlich haben all das naturwissenschaftliche Forschen und all die großartigen Erkenntniss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eine Frage beiseite geschoben, die sich heute unübersehbar wieder in den Vordergrund drängt: die Frage nach dem Sinn des Lebens. In den Boomjahrhunderten seit der Renaissance haben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die Religionen immer skrupulöser und zaghafter werden lassen, die sinnstiften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immer weiter zurückgedrängt, weil diese glaubten, ihre religiösen Wahrheiten dem natur-

wissenschaftlichen Wahrheitsbegriff unterwerfen zu müssen. Sie verkannten dabei, dass alles naturwissenschaftliche Wissen die geistigen, seelischen und emotionalen Bedürfnisse des Menschen unbeantwortet lässt, und dass die religiöse Wahrheit über den Sinn des Lebens anderen Grammatiken folgt als die naturwissenschaftliche. Ludwig Wittgenstein hat dies am Ende seines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1921] – der Bibel des philosophischen Positivismus – die Existenz der zwei Wahrheiten –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Wahrheit auf der einen, der religiös-philosophisch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 sehr schön umschrieben: nachdem er selbstbewusst resümiert, dass seine Gedanken „unantastbar und definitiv“ wahr sind und mit seiner Schrift die „Probleme [sc. der Philosophie] im Wesentlichen gelöst zu haben“, räumt er ein, dass damit die Lebensfragen des Menschen noch gar nicht berührt seien. Nur dazu – so Wittgenstein als konsequenter Positivist – könne er nichts sagen. Letzter berühmter Satz: „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über muss man Schweigen.“

Worüber Positivisten schweigen müssen, darüber müssen Religionen sprechen¹ – und sie tun es auch, seit Jahrhunderten, und sie tun es traditionell auch unter dem Etikett „Wahrheit“. Als Offenbarungsreligionen verkünden sie die Wahrheit Gottes, als Naturreligionen die Wahrheit der Natur (des Himmels, der Welt). Doch der Wahrheitsbegriff der Religionen ist ein anderer als der der positivistischen Naturwissenschaften der Neuzeit. Spätestens seit der kriti-

1 Gleiches gilt auch für die praktische Philosophie und die das Leben interpretieren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Da diese aber typischerweise ohne politische Implikationen und Herrschaftsansprüche auftreten, sondern „bei sich“ bleiben und damit kein staatsphilosophisches Ordnungsproblem aufwerfen, seien sie im folgenden nicht berücksichtigt.

schen Erkenntnistheorie Kants und Hegels können wir diesen Unterschied auch begrifflich festmachen, weil wir wissen, wo die Grenzen der reinen Vernunft liegen. Das religiöse Wissen ist mit dem Wissensbegriff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nicht kompatibel, ja geradezu konträr. Am schönsten hat Kant diese Differenz festgehalten, als er in eigener Sache apologetisch formulierte: er habe doch mit sein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nur die Grenzen des Wissens bestimmt, um Platz für den Glauben zu lassen“.

Abstrakter formuliert: philosophische und religiöse Glaubenswahrheiten sind nicht – objektive, naturwissenschaftliche – Wahrheit, sondern – subjektiver, sinnvermittelnder – Glaube. Man kann diesen Glauben „Wahrheit“ nennen, und man tut dies traditionell ja auch. Aber man sollte nie vergessen, dass der – legitime – Wahrheitsbegriff der Religionen einen anderen Quellgrund hat (Gott), eine andere Aufgabe (Sinn) und eine andere Logik (Subjektivität) hat als der der exakten Naturwissenschaften. Er will nicht von allen als notwendig und bewiesen anerkannt werden, sondern den einzelnen Menschen die Frage nach dem Sinn seines Lebens beantworten.

Damit greift der religiöse Wahrheitsbegriff einerseits thematisch weiter aus als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 weil er das Leben in seiner ganzen Fülle umgreift. Er ist darüber hinaus andererseits aber auch totalitärer, kompromissloser, intoleranter und unwandelbarer. Auch hier gibt die Bibel den Takt vor: „Du sollst keinen Gott neben mir haben“ (Exodus 20, 3). Während die naturwissenschaftliche Wahrheit stets und von vornherein nur eine vorläufige Wahrheit ist, zum Beweis des Gegenteils offen auffordert und einlädt, die

widerlegte Wahrheit der besseren Erkenntnis ebenso sportlich wie widerstandslos Platz macht, können religiöse Glaubenswahrheiten nicht widerlegt werden. Da sie in subjektiven, nicht rational zugänglichen Glaubensüberzeugungen wurzeln, brauchen sie sich von Anfechtungen nicht beirren lassen. Im Gegenteil: je ungläubiger die Welt, desto größer die Herausforderung, sie im und durch den Glauben zu erlösen. Religiöser Glaube lässt sich nicht belehren, lernt nicht, sondern lehrt und missioniert. Wenn ein solcher Glaube nicht „bei sich“ bleibt, sondern auch eine universale und umfassende Erklärung für die Welt liefert, auf alle Fragen Antworten bereithält und alle Antworten zudem auch noch solche sind, die über Himmel oder Hölle, Erlösung oder Verdammung mitentscheiden, dann wird klar, dass religiöse Wahrheit den Kompromiss nicht dulden kann und Zweifel, Anfechtungen und Häresie bekämpfen muss. Dann wird das latent totalitäre Potential religiöser Wahrheit ansatzweise erkennbar. Dieses wird solange kaum sichtbar, als in relativ homogenen Gemeinschaften die eine Wahrheit von allen oder doch von den meisten geteilt wird: in solchen Staaten hat die Menschheit die größten Leistungen ihrer Kultur hervorgebracht. Wird die eine, alleinseligmachende Wahrheit aber in politisch relevanter Weise in Frage gestellt, droht die eine und universale Wahrheit zu zerbrechen, ihre sinnstiftende und orientierungsleitende Funktion zu verlieren, dann zeigt die religiöse Wahrheit ihr unangenehmes, intolerantes, militantes Gesicht. Werden diese religiösen Wahrheiten dann auch noch von der politischen Macht gestützt bzw. instrumentalisiert, dann kann sich das polemogene, ja terroristische Potential religiöser Wahrheit zur vollen Blüte entfalten. Und damit kommt – endlich – der Staat ins Spiel:

IV. Vom Hüter der Wahrheit zum Schutzgaranten gegen die Wahrheit

Ein Beispiel für eine Koalition von Religion und Staat bildete das Heilige Römische Reich Deutscher Nation². Dieses hatte bekanntlich seine friedens-, einheits- und sinnstiftende Kraft daraus gezogen, dass es eine heilige Ordnung, die alle Lebensbereiche umfasste und ungeschieden geistlich-religiös und weltlich-politisch war. Kaiser und Papst waren nicht Repräsentanten der geistlichen und der weltlichen Ordnung, sondern Inhaber verschiedener Ämter der einen *res publica christiana*. Aufgelöst wurde diese Einheitsvorstellung vor allem von der sich zur rationalen Wissenschaft bildenden Theologie: diese erarbeitete die Trennung von geistlich und weltlich. Trennung und Verselbständigung von Staat und Kirche beinhaltete auch die Möglichkeit des Konfliktes zwischen ihnen. Konnte das Papsttum den Investiturstreit noch für sich entscheiden, so wurde die geistliche Seite in dem Augenblick entscheidend geschwächt, als der Glaube seine einheitsstiftende Funktion und Rom damit die legitimierende Grundlage seines Machtanspruchs verlor, Hüter der Wahrheit zu sein. Mit dem Thesenanschlag Martin Luthers im Jahre 1517 brach die Einheit des katholischen Glaubens auf³ und das polemogene Potential zweier konkurrierender Wahrheitsansprüche entlud sich brutal. Exemplarisch zeigt sich dieses Selbstverständnis der Streitparteien im Gelöbnis, das Ferdinand II. von Österreich bei Antritt seiner Regierung in der Steiermark ablegte: „Lieber über eine Wüste herrschen, lieber Wasser und Brot genießen, mit Weib und Kind betteln gehen, seinen Leib in Stücke hauen lassen, als ein Unrecht gegen

die Kirche, als die Ketzerei zu dulden.“ In dieser Logik dieser mörderischen Wahrheit waren sich alle Konfliktparteien – Katholiken, Lutheraner und Reformierte – einig. Der religiöse Konflikt musste als politischer Kampf ebenso gnadenlos und total werden, wie er als religiöser kompromisslos war. Weder theologisch noch militärisch war der hermeneutische Bürgerkrieg über Jahrzehnte hinweg lösbar. Er stürzte große Teile Europas – Deutschland, England, Frankreich – in jahrzehntelange Massaker, entvölkerte ganze Landstriche und ihm fiel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Bevölkerung zum Opfer.

Gerade dadurch aber legte der religiös motivierte Bürgerkrieg ungewollt und unbewusst den Grund für den praktischen Durchbruch der theoretischen Idee des souveränen und säkularen Staates. Denn der Ausweg aus der Krise konnte nur in der politischen Entmachtung der religiösen Mächte liegen. Zu diesem Zweck musste eine kultur- und konfessionsunabhängige Form der Wahrheit gefunden werden, deren Wahrheit alle Menschen einsehen können und kraft apriorischer Überzeugungen zustimmen müssen, gleichgültig welcher Kultur, Religion, Nation oder Volk sie angehörten. Inhalt dieser säkularen Wahrheit war der Frieden, ihr Sachwalter der absolutistische, dafür religiös neutrale Staat. Nur dieser kann den Frieden im Innern des Staates, das Ende des *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 als souveräne Entscheidungseinheit und Ordnungsmacht garantieren und damit Heimstatt aller Bürger sein, ungeachtet ihrer Bekenntnisse. Der moderne Staat ist seither neutrale Instanz, die über den streitenden Religionsparteien steht. Mit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hörte der Staat schließlich gänzlich auf, Religion und Kirche zu seiner Sache zu machen. Religion wird Privat-

angelegenheit des Einzelnen. Der Staat entsagt der Wahrheit um des Friedens willen, er ist nur noch politische Macht, aber kein Hüter der Wahrheit: „auctoritas non veritas facit legem“ – mit diesen Worten bringt Thomas Hobbes den modernen Staat auf den Begriff.

Doch eine „Wahrheit“ nimmt auch der säkulare Staat für sich in Anspruch: die unbedingte Wahrung des Friedens. Nur kann der Staat für diese „Wahrheit“ nicht mehr eine übergreifende transzendente ins Feld führen. Der säkulare Staat kann und will nicht über absolute Wahrheiten und Werte entscheiden. Seine Wahrheit ist – kantianisch formuliert – eine transzendente, gerichtet auf die formellen und verfahrensmäßigen Bedingungen der Möglichkeit eines friedlichen und freien Zusammenlebens der Bürger. Sie besteht in der staatlich garantierten prinzipiellen Ergebnisoffenheit des politischen Prozesses, dessen Resultate um des Friedens willen von allen akzeptiert werden müssen. Der weltanschaulich neutrale Staat begnügt sich mit dieser vorletzten Wahrheit der Vernunft, um nicht in den letzten Dingen der Wahrheit Partei ergreifen zu müssen. Als Staat entsagt er letzter Erkenntnis prinzipiell: nicht nur aus erkenntnistheoretischer Skepsis, sondern vor allem aus vernunftgeleiteter Überzeugung. Im Dienste seines unbedingten Friedensauftrages beschränkt er seine Aufgabe darauf, die allen Bürgern gleiche Freiheit unter Friedlichkeitsbedingungen zu garantieren.

Freilich kann auch der freiheitliche Verfassungsstaat der Logik der Wahrheit nicht entgehen: auch seine Wahrheit ist nicht kompromissfähig. Seine Funktion als Friedensgarant steht nicht zur Disposition, ist nicht verhandlungs- und

kompromissfähig – auch und gerade nicht in Zeiten der fundamentalistischen Herausforderung säkularer Staatlichkeit von Seiten islamistischer Fundamentalisten. Hier kämpft – soweit ersichtlich – wieder und möglicherweise die letzte religiöse Glaubenswahrheit, d.h. universalistische Wahrheitsfraktion mit nie gekannter terroristischer Gewalt gegen die Ungläubigen in aller Welt: Verlauf unklar, Ende offen, Ergebnis nicht prognostizierbar. Jedenfalls bekennt sich die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ls wehrhafte Demokratie dazu, sich gegen ihre Feinde von innen und außen schützen und zur Wehr zu setzen. Diese Logik rechtstaatlicher Selbstbehauptung⁴ kleidet sich in das Paradox: Keine Freiheit den Feinden der Freiheit, bzw. keine Toleranz gegenüber Intoleranz.⁵

V. Die Wahrheit und der Staat

Doch das kollektive Sinnvakuum, das sich nach Wegfall einer alle Menschen in einem Staat verbindenden einen und einenden Glaubensüberzeugung ausbreitete, lastete schwer auf den Menschen. Die Romantiker aller Zeiten beklagten die schmerzvolle Entzweiung des Menschen, der sich nun in zwei unabhängigen Systemen – Staat und Religion – mit nicht deckungsgleichen Ansprüchen wiederfand, und verherrlichten das Mittelalter als Projektion des verlorenen Paradieses der Einheit. Tatsächlich vermag die formale, offene, relativistische Wahrheit des freiheitlichen Verfassungsstaates vielleicht den Verstand, nicht aber das Herz zu befriedigen: dieses sucht weiterhin Antworten auf existentielle Sinnfragen. Und tatsächlich konnte sich auch nach Aufklärung und französischer Revolution der Staat bis heute der Gefahr

der Instrumentalisierung als sinnvermittelnde oder sinngebende Einrichtung nicht entziehen. So wurde das 20. Jahrhundert als das von zwei totalitären, staatlich exekutierten Wahrheitsmissionen erlebt, und derzeit können wir eine freiheitliche Wahrheitsmission für die Menschenrechte beobachten.

1. Die totalitären Missionen des 20. Jahrhunderts

So wurde die Sehnsucht nach Auffüllung der religiösen Sinnleere historisch schon bald ideologisch gestillt, aber anders als sich die Romantiker des 19. Jahrhunderts je hätten träumen lassen. Die jenseitige Erlösungsvorstellung der Religionen wurde profaniert, mit diesseitigen Hoffnungsvorstellungen angereichert und als wahre Ideologie vom Staat instrumentalisiert: die beiden totalitären politischen Bewegungen des letzten Jahrhunderts versprachen den Menschen den Himmel künftiger Herrschaftsfreiheit und brachten ihnen die Hölle auf Erden. Mit dem Epochenwandel 1989/90 ist das Ende dieser Großideologien endgültig eingeleitet. Doch die nächste ist schon auf dem Wege:

2. Weltmission Menschenrechte

Heute bestimmt die Idee der Menschenrechte in noch ungebrochenem Glanz Identität und Selbstverständnis der westlichen Verfassungsstaaten: an der rechtlichen Gewährung und effektiven Gewährleistung von Freiheit und Demokratie will man sich selbst messen lassen und misst die anderen Staaten.¹ Zugrunde liegt der Menschenrechtspolitik des Westens die Gewissheit, dass Freiheit und Gleichheit des Individuums politisch wahr und historisch notwendig sind: „Allein im Glanz ihrer Majestät

und der Herrschaft der Wahrheit über die Menschen“ regieren die Menschenrechte in den Verfassungen, aufgeschrieben „zur Belehrung der ganzen Welt“. ² Daher soll „an den Menschenrechten – dieser reifsten und edelsten Frucht westlichen Staatsdenkens – die ganze Welt genesen“. Überall, am besten sofort, sollen Freiheit und Menschenrechte, Markt und Demokratie durchgesetzt werden. Die Idee universaler Menschenrechte ist geradezu säkularer Wahrheitsbesitz der westlichen Welt – mit den entsprechenden, historisch bekannten Konsequenzen. Denn zur Logik universaler Wahrheitsansprüche gehört – wieder einmal –, dass sie sich nicht damit begnügen, als reine Lehre und im Bewusstsein theoretischer Richtigkeit in Distanz zum Leben zu verharren: sie wollen wirklich werden. Die Sicherheit des Wahrheitsbesitzes verpflichtet: man kann nicht in der Wahrheit sein, ohne daraus Konsequenzen zu ziehen. Wahrheitsbesitz schützt vor Opportunismus, kennt aber auch keinen Kompromiss, vermittelt Orientierungssicherheit, zwingt aber auch zur Intoleranz gegenüber der Unwahrheit. Solange das bei Ratschlägen, Beratungen und Rechtsstaatsförderprogrammen bleibt, ist dagegen nichts einzuwenden. Wenn aber die Menschenrechte im Wege humanitärer Interventionen mit Gewalt und kulturagnostisch und -ignorierend weltweit implantiert werden sollen, dann muss die Menschenrechtsexportpolitik des Westens – zumal, aber nicht nur die ihrer Vormacht – aufpassen, sich und ihre Ideale nicht uno actu zu pervertieren: Abu Ghraib war ein erstes – und nicht das einzige – Menetekel.

Die freiheitlichen Verfassungsstaaten dieser Welt sind also gut beraten, mit ihrer guten Politik und menschenrechtlichen Wahrheit „bei sich“

zu bleiben. Setzen sie menschrechtliche Standards und Vorbilder, werden die Interessenten sich schon finden und von alleine und eigenständig dem Vorbild folgen. Der Staat sollte sich nach allen historischen Erfahrungen nie wieder gewaltsam in den Dienst einer Wahrheit stellen und stellen lassen. Die Idee der Menschenrechte ist eine historisch kontingente Er rungenschaft, eine Kulturleistung, auf die man stolz sein kann, für die man eintreten und werben sollte. Aber sie ist keine quasi religiöse Wahrheit und legitimiert keine Wahrheitsmissionen und –feldzüge. Sie ist von dieser Welt der vorletzten Wahrheiten und da sollte sie in ihrer Relativität und Kontingenz auch bleiben

VI. Die Wahrheiten im Staat

Wo bleibt denn nun die Orientierung und Sinn gebende religiöse Wahrheit im freiheitlichen Staat? Lange Zeit glaubte das moderne Aufklärungsdenken, dass das Religiöse in der Gesellschaft allmählich von selbst absterben werde: eine Entziehungskur würde reichen, die Menschen vom Opium des Volkes zu entwöhnen. Nachdem Nietzsche „Gott für tot“ erklärt hatte, schien tatsächlich eine tiefgreifende Säkularisierung Europas das Zeichen der Zeit zu sein. Und der Zustand des Christentums in Europa scheint diese Annahme eher zu bestätigen denn zu dementieren. Allerdings gibt es auch, vor allem in Afrika, Lateinamerika und in den islamischen Ländern klare und beeindruckende Gegenbewegungen wachsender religiöser Vitalität. Wie dem auch sei: das mit dem Absterben der Religion und ihren Wahrheiten wird sich jedenfalls noch etwas hinziehen. Bis dahin bleibt die Frage nach der religiösen Wahrheit im Staat aktuelle politische und

staatsrechtliche Herausforderung.

Die Antwort ist verfassungsrechtlich relativ einfach: im modernen säkularen und freiheitlichen Staat sind religiöse und weltanschauliche Wahrheiten durch Grundrechte und Demokratie ebenso legitimiert wie pluralisiert. Staatlich eingeräumte liberale, d.h. negatorische „Freiheit-von“, lassen die entscheidenden Lebens- und Wahrheitsfragen des Menschen bewusst unbeantwortet und dem Individuum zur freien Entscheidung überantwortet. Während der Staat diese Wahrheitsfragen verfassungsrechtlich nicht beantworten darf und will, müssen der einzelne und die Religionsgemeinschaften sie beantworten – freilich der Religionsfreiheit wegen in Konkurrenz zu konkurrierenden Religions- und Weltanschauungsgemeinschaften. Aus grundrechtlicher Sicht sind religiös fundierte Wahrheitsaussagen also nichts anderes als – verfassungsrechtlich legitime – Ausübungen von Religions- resp. Meinungsfreiheit. Es gilt der Satz: „Die Freiheit eröffnet den Weg zur persönlich zu findenden Wahrheit“, sei es allein oder sei es im Rahmen einer Religionsgemeinschaft.

In diesem Kontext ist es das Proprium des säkularen Staates, dass er selbst für sein Handeln nicht auf Begründungen zurückgreifen darf, die auf einer religiösen oder weltanschaulichen Wahrheit beruhen. Ferner muss er das friedliche Nebeneinander der verschiedenen Glaubensüberzeugungen respektieren und garantieren, sie zur wechselseitigen Toleranz notfalls zwingen. Religiöse Wahrheitsüberzeugungen legitimieren im Verfassungsstaat aus sich heraus keinen allgemein-verbindlichen Verbindlichkeitsanspruch und können sich im

relativistischen demokratischen Diskurs nur im Wege von Mehrheitsentscheidungen durchsetzen. Ansonsten sind es grundrechtlich legitim vertretbare Sachposition, aber ohne jede Verbindlichkeit für die, die nicht glauben.

Allerdings ist der Staat an der Beantwortung von Sinnbedürfnissen der Menschen ebenso interessiert wie diese es selbst sind oder sein müssten. Freilich bedeutet die Beantwortung von Sinnfragen für den Einzelnen im modernen Staat eine nicht unerhebliche Zumutung: er muss sich glaubensmäßig entscheiden, ohne sich in einem empirisch-positivistischen Sinne sicher sein zu können, dass seine Wahrheit wahr ist. Er muss sich einer Wahrheit anverwandeln und wird das Bewusstsein, dass er es war, der sich dieser Wahrheit subjektiv verschrieben hat, nicht mehr los werden. Sein Glaubensakt wurzelt in seiner Subjektivität, ist ihm also nicht objektiv vorgegeben, sondern kann durch einen *actus contrarius* jederzeit revidiert werden. Das macht das Glauben buchstäblich zum Wagnis. Daher haben die Menschen zu allen Zeiten versucht, religiöse Wahrheiten und positive (Glaubens-) Setzungen als etwas „Nicht-Gemachtes“ erscheinen zu lassen (Hegel) und als das Absolute, nicht Hinterfragbare auszugeben: so wurde die Menschenwürde unantastbar und die Menschenrechte unverfügbar.³

Für den, der unter diesen Umständen die Kraft zum Glauben hat, ist der Lohn für seine Glaubensüberzeugung allerdings groß: „die Wahrheit wird euch frei machen“, verspricht die biblische Offenbarung [Johannes 8, 31]. Aber auch Gesellschaft und Staat profitieren von gelebter Glaubensvitalität der Bürger: indem die liberale Freiheit dem Einzelnen die Freiheit zur Suche,

zum Auffinden und zum Leben der – subjektiven – Wahrheit gibt, partizipieren sie daran, dass dieser Glaube buchstäblich „Berge zu versetzen“ vermag. Tatsächlich sind diese subjektiven Glaubenswahrheiten der Menschen zwar nur „Möglichkeiten des Denkens“, sie schaffen aber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die Wirklichkeiten des Seins“ (Viktor E. Frankl). Und tatsächlich: die bedeutendsten Zeugnisse der Menschheit in der Welt sind in aller Regel „Wirklichkeit gewordene Möglichkeiten des Denkens“. Derart partizipieren wir heute noch an den religiösen Glaubenszeugnissen vergangener Generationen. Ob im Himmelstempel in Peking, den Pyramiden von Gizeh oder im Kölner Dom – überall bekommt man eine Ahnung von der Sehnsucht der Menschen nach dem verlorenen Paradies, eine zumindest ästhetische Ahnung von dem, was Wahrheit an kreativer Schöpfungskraft freizusetzen in der Lage ist. Und was hat der Staat damit zu tun? Nichts. Und das ist auch gut so.

